

●李刚倪波

陶行知与新图书馆运动

摘要 陶行知的实用主义知识论、工具主义的图书论是新图书馆运动的学理资源。他认为图书馆的生命在于为民众教育服务。他为创设中华图书馆协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领导创办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教育图书馆;发展了“平民读书处”这种重要的民众教育形式,对图书馆开展民众辅导具有很大启发作用。陶行知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活动证明他是新图书馆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参考文献 37。

关键词 新图书馆运动 图书馆史 陶行知研究 中华图书馆协会

分类号 G259.29

ABSTRACT Tao Xingzhi's pragmatist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instrumentalist theory of book are theoretical resources of the New Library Movement. He thought that the life of library is to serve public education.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 He established an educational library under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Promotion and developed "Civilian Reading Places", an important form for public education. Both hi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prove that he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New Library Movement. 37 refs.

KEY WORDS New Library Movement. Library history. Studies of Tao Xingzhi. Chinese Library Association.

CLASS NUMBER G259.29

“新图书馆运动”是目前图书馆学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目前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史料的挖掘还不够深入,这样就无法把研究推向深入;二是研究的对象有重大疏漏。比如,对陶行知这样一位和新图书馆运动有重大关系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就缺乏必要的研究。通过对史料的初步梳理,我们认为陶行知对新图书馆运动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几点:①系统论述了新图书馆运动的知识论基础;②亲身参与并成为新图书馆运动的领导人之一;③他的图书馆实践是新图书馆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书是为了用的”——新图书馆运动的学理资源

中国近代的图书馆学知识谱系有两个源头:一是西方近代的图书馆学,二是中国古代的藏书思想和目录、版本、考据学说。就“学缘”的远近关系而言,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和近代西方图书馆学更为密切。就具体学派源流来说,哥伦比亚图书馆管理学校(Columbia 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和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对近代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至关重要。其重要性表现在早期的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家,比如沈祖荣、胡庆生、李小缘、洪范五、袁同礼、戴志骞、杨昭愬、刘国钧等都是接受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

假如美国现代图书馆学历史从1887年创办的哥

伦比亚图书馆管理学校算起,那么这个时段正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兴起的时期。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强调教育的民主性、平民性,强调教育要为民众的生活服务。进步主义的教育思想认为,学校需要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大学必须关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大学是一个社会机构,社会服务是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1]。哈里斯(William Torrey Haarris, 1835~1909)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旗手。美国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实际上深受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影响,因此,19世纪末诞生的美国图书馆学强调实用、强调民众服务是毫不奇怪的。就思想基础而言,中国近代早期图书馆学家也深受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对这一思想做出最为详尽阐述的并不是图书馆学家,而是杜威的高足——陶行知。

陶行知的知识论是他的“书论”的基础,而陶行知的“书论”又是其图书馆思想的基础。假如遵从图书馆“要素说”理论,图书无疑是近代图书馆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对于图书性质、功用的看法无疑会影响到对图书馆本质和功能的看法。我们下面就沿着“知识论——图书论——图书馆论”这个线索考察陶行知的观点,通过这种考察来寻找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的知识论基础。

陶行知作为杜威的高足之一,他的知识论无疑是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和所有的实用主义思想家一

样,他非常强调经验和知识的关系。他认为:“知识有真有伪。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不是从经验里发出来的知识便是伪知识。”^[2]陶行知指出:“接知如接枝”。书本知识对于读者来说是间接经验,“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部分。这样一来,别人的知识在我们的经验里活着,我们的经验也就生长到别人知识里开花结果。至此,别人的知识便成了我们的真知识。”^[3]陶行知强调知识来源于经验,书本知识如果不能和自己的经验相结合就不能变成自己活知识的一部分。后来,陶行知又利用墨子的知识分类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这种经验主义知识论。墨子把知识分成“亲知”、“闻知”、“说知”三种,陶行知说:“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他认为闻知和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方能发生效力,行是知之始^[4]。这种说法是“接知如接枝”的另外一种表述。陶行知还进一步指出,知识的真理性表现在其改造环境和社会的有效性上。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的工具主义知识论。

在这样的知识论基础上,陶行知认为:“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是一样的性质,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伪知识,读他一辈子,不能辨别他的真伪;可是用他一下,书的本来面目便显示出来。”他甚至天才地提出了近代以后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知识竞争”的观点,他说:“20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真知识的民族。凡是崇拜伪知识的民族,都要渐就衰弱以至于灭亡。360行中决没有教书匠、读书人的地位,东西两半球上面也没有中华书呆国的立足点。我们个人与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识为基础。”^[5]陶行知对这种工具主义的“图书论”不断加以阐述,最极端的说法是“书只是一种工具,只能用,不可读。……只知道读书不会做别的事,便是书呆子,书呆子和只会吃饭的饭桶一个样子。”^[6]陶行知批评中国教育迷信书本,他说中国的教员、学生,实在太迷信书本了。他们以为书本可以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他们以为要想耕田、织布、治国、平天下,只要读书就会了。他认为书本和望远镜、显微镜、锄头、斧头、笔杆、枪杆一样都是工具,都需要活用^[7]。陶行知说遇到

一本书,我们用书,有时要读,有时要讲,有时要听,有时要看;但是读、讲、听、看,都有一贯的目的,这目的便是它们对于“用”的贡献^[8]。

对于陶行知的经验主义知识论和工具主义“图书论”,我们且不做哲学层面的评价。就其历史作用来说,它对于克服脱离实践的书籍崇拜、读书至上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传统,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陶行知虽然不过是一个个案,但是他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左右从美国归来的一批留学生基本的知识论取向。从陶行知的知识论和图书论,我们可以窥见那批美国回来的图书馆学家的知识论取向。

陶行知的知识论和图书论,必然影响着他对图书馆性质和功能的看法。1929年1月28日,在南京金陵大学科学馆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陶行知发表了演讲,专门阐述了他对图书馆的意见。他指出:“图书馆事业之进步可分为三时期:一为藏书时期,即收罗与庋藏;二为看书时期;三为用书时期,即书为人所用,而非人为书所役,此时期实为图书馆之新纪元。……图书馆之设置,对此点须特别注意,不然即失去图书馆之真意义矣。”^[9]

陶行知对图书馆意义的阐述是其知识论和图书论的自然延续。简而言之就是“书是为了用的”,图书馆的功能就是为人们的用书服务,设置图书馆的目的是方便人们“用书”。这个观点提出的时间比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还要早。图书馆学五定律的核心是第一定律——“书是为了用的”。而陶行知对此有完全相同的表述——“书是为了用的”,这可以说是“陶行知的图书馆学定律”。陶行知还把图书馆看成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1923年,在平民教育运动中,陶行知就提出要“创设平民图书馆”^[10]。1925年,陶行知等人再次重申:“近今教育趋势,多利赖于图书馆,而民族文化,亦即于是觐之。……非力谋图书馆教育之发展,不可与列邦争数千年文化之威权。”^[11]可以说,陶行知把图书馆看成是一个社会机构,认为图书馆本质上是社会改造的工具,教育是图书馆的基本功能。这不仅是专业图书馆学家的观点,甚至一般教育界专家也持如此观点。1924年10月19日,安徽省教育厅程天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所谓近代图书馆,简捷言之,就是以科学的及经济的方法,将一切有用的图书及其他印刷品,收罗整理而保管之,使社会上一切人士均能自由阅览的一种机关。……馆舍,图书,甚至于馆长馆员都只能算是图书馆的工具,它的效用全在读者身上,唯有读者才是图书的唯一主人。主人不在,单有工

具,就等于失去了生命的躯壳。”^[12]民主性、民众性、开放性是图书馆的基本属性,而这正是新图书馆运动时期对图书馆的基本看法,是近代中国图书馆学产生时期已经达到的理论深度。

2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催产婆”

陶行知1910年进入南京金陵大学,1914年毕业后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学习,1915年获得政治学文科硕士,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著名学者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1917年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同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由于陶行知是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物,美国教育的显赫经历,加上基督徒的献身精神,所以,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的时候,他被推选为主任干事。中华教育改进社由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合并而成。它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张伯苓、黄炎培、袁希涛、汪兆铭、李建勋、熊希龄等9人为董事,梁启超、严修、张謇、张一麀、李煜瀛及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为名誉董事^[13]。1924年,韦棣华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退还庚子赔款余额决议案”作证时指出: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哥伦比亚大学孟禄博士赞成组织的,“据我所知,这个教育团体在中国是最有力量的。”^[14]

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之初,就把图书馆教育列为专门调查内容,陶行知委托洪范五开展学术教育调查,委托沈祖荣开展图书馆教育调查^[15]。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年会时,戴志騫、洪范五等人参加了这个年会。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帮助下,他们立即开始组建图书馆学研究委员会。他们的目标是:推动创立更多的图书馆;推广较好的图书馆管理方法;吸引更多的人利用图书馆。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了24个专门委员会,图书馆教育委员会是其中一个。主任委员是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戴志騫,副主任是金陵大学的洪范五,书记是程时焯。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共有6名委员。在清华学校举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上,图书馆教育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一个议案,决定组织地方图书馆协会。大会顺利通过了这个决议^[16]。

1924年2月19日,中华教育改进社致函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主任戴志騫,并通知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员在各地图书馆办事者,尽早发起组织图书馆协会,并约北京各图书馆于3月16日下午2时,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总事务所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筹备会,拟定北京图书

馆协会简章八则。1924年3月30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总事务所开北京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到会者有江庸、杨杰、戴志騫、冯陈祖怡、查修等30人,大会通过了简章,并选戴志騫为正会长,冯陈祖怡为副会长,查修为书记。4月24日、5月18日先后在清华学校、北京大学开常委会,除讨论事务性问题外,还举行了图书馆学术讨论会。至此,北京图书馆协会有甲种会员18人,乙种会员36人。南京图书馆协会于1924年5月31日在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开第一次会议,到会的有南京各学校图书馆代表24人。选举洪范五为临时主席,朱家治为临时书记,当场拟定简章。6月7日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成立事项。天津图书馆协会于5月25日开筹备会,共推王文山为临时主席,刘激清为临时书记,到会各学校图书馆代表10余人。开封图书馆协会于5月29日下午4点,在河南第一图书馆开筹备会。到会者有第一图书馆、河南图书馆、中大、一师、一中等各校图书馆代表。选举了何日章为会长,齐性一为副会长,李燕亭为书记兼会计。决议每月在各图书馆轮流开常会一次。南阳图书馆协会5月26日成立,推选杨庭宪为正会长,李寰宇为副会长,王洪策为书记。浙江图书馆协会4月26日成立,致函北京图书馆协会交换章程,互通声息。各地图书馆协会呈现出共同合作的良好现象^[17]。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年会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大会决定尽早成立中华图书馆协会。1925年4月25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6月2日在北京举行成立仪式。各省图书馆与会代表100余人出席,梁启超、韦棣华以及应中国教育改进社邀请来华帮助中国制定公共图书馆发展规划的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鲍士伟在成立仪式上发表讲话。中华图书馆协会总事务所设在北京,其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前期设董事部和执行部,第一任董事部部长为梁启超,书记为袁同礼,执行部部长为戴志騫,副部长为杜定友、何日章。大会选举了15名董事:梁启超、袁同礼、颜惠庆、蔡元培、范源濂、熊希龄、胡适、袁希涛、洪范五、丁文江、王正庭、沈祖荣、钟福庆、陶行知、余日章^[18]。中华图书馆协会设有分类、编目、索引、出版、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建筑等专门委员会。

中华图书馆协会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关系,从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没有中华教育改进社就不会有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产生。陶行知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用“催产婆”

一词来形容绝非过分。北伐战争以后中华教育改进社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陶行知作为海内教育名流一直关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陶行知还亲自参加会议,并被选为由1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可见陶行知在图书馆界的影响。

3 新图书馆运动理念的践行

陶行知的图书馆活动几乎贯穿了他步入社会后的所有阶段。回国以后,陶行知的教育与社会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时期、南京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时期、山海工学团时期、重庆育才学校时期等。属于新图书馆运动的时期主要集中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时期。为了讨论的需要我们也顺便简要地考察他后来几个时期的图书馆活动,以便看出其图书馆思想的一致性。

陶行知在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时期,除了积极推动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产生外,还非常注重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建设。他一直试图建立一个专业的教育图书馆,为研究教育的人提供高水准的图书馆服务。陶行知指出:“本社附设图书馆,宗旨是辅助专家对于教育学术的研究,并帮助总事务所所在地的教员增进普通学识。”^[19]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虽然说书不是为了读的,而是为了用的,其实,他作为一个资深的教育专家和当时中国一流的思想家怎么会不明白图书馆的学术价值。

在第二次年会以后的1923年夏天,中华教育改进社开始筹备教育图书馆,委托高仁山起草建设教育图书馆的计划^[20]。改进社把总事务所所在的帝王庙东殿作为图书馆馆舍,面积约2000平方尺,所备书架可以存书20000册以上,可以同时供100余人阅览。内部设备委托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戴志鸾负责筹备,安排东南大学图书馆主任洪范五、朱家治选择图书。陶行知利用自己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社会声望向国内外出版新闻机构募集图书,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上海医学书局、北京晨报社、中美图书公司、牛津图书公司都赠与大宗图书^[21]。商务印书馆赠图书992种,共2000余册,多数为该馆出版的科学书籍、辞典、小学中学课本、英文课本、各种地图、挂图等;中华书局送图书600余种,共1700余册;中美图书公司赠西文图书101册,大都关于教育、文学、商业等;亚东图书馆赠图书40余册,为新出版的新文学书籍;群益书社赠

图书47册,为该社出版的科学书籍、英文课本、辞典、文学等;北京晨报社赠图书10余册;上海医学书局赠该局出版图书30余册;牛津图书公司赠中西文图书50余册,大都关于文学、历史等书;申报馆赠《最近之五十年》1册;中华职业教育社赠《职业教育研究》1册;英国非利比公司赠西文书60余册。除了以上外,英美各大学寄赠了许多章程,书馆寄赠目录,研究会寄赠研究报告等,共计400余种。另外,教育改进社请该社职员章洪熙按照胡适的《一个最小限度之国学书目》购买有关图书。1923年7月,教育改进社请东南大学图书馆专家朱家治到北京整理这批图书。所有英文书籍均分类登记,并建立了台账。所有中文书籍均登记入账加盖图书馆馆章^[22]。教育图书馆原计划1923年8月开馆,因为中华教育改进社全力投入平民教育运动,图书馆的事情因而耽搁,未能如期开馆。陶行知还特别就此事向参加第二次年会的代表致歉,并号召与会代表继续捐书^[23]。

1924年1月,陶行知强调:“教育图书馆,照上年计划继续进行。”^[24]同年春天正式聘请高仁山为教育图书馆主任。又发函至欧美各大学征集简章及印刷品,收到了400余件印刷品。同年7月4日,在第三次年会的社务报告中,陶行知指出教育改进社1924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是“筹办全国教育陈列所及图书馆”^[25]。除了继续向海内外征集图书外,教育馆还陆续购买了各国教育书籍。可以说,在陶行知的亲自领导下,经过3年的建设,教育图书馆初具规模,它应该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协会图书馆之一。

1924年初,陶行知还和范源濂、许世英、胡适、梁启超、蒋梦麟、熊希龄、洪范五等人一起发起建设“东原图书馆”,以纪念戴东原诞辰200周年。该馆设在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学校内,“与该校互助合作”,但图书馆为独立机关。该图书馆收藏戴东原本人所有著作、戴东原参与写作的著作、研究戴东原及相关著作;师范学校应有的图书、杂志、报章^[26]。该馆应该是近代中国较早的纪念图书馆。

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后,陶行知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组织平民读书运动中。如果说创办教育图书馆、东原图书馆是面向研究层面和社会上层的,那么平民读书运动则是面向普通民众的。民众教育思潮与平民教育运动是新图书馆运动的重要历史背景。陶行知亲自领导的平民读书运动是新图书馆运动的重要历史语境,读书现象也应是图书馆学史当然的研究范围。

陶行知认为平民读书运动是平民教育运动的第一步。陶行知对于平民读书运动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点:①明确指出平民读书运动并非纯粹为“读书识字”,他认为“书只是一种工具,如一把刀,可以切菜,可以杀人,也可以自杀。”重要的是要通过读书运动培养出国民精神,“把公民和读书的精神化合在一处。”^[27]陶行知认为国民精神最重要的是每个国民要有自治的能力,“要个个有自治的能力,非人人读书识字不行……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余实业、交通、财政、司法……都容易了。”^[28]②编辑出版了一套实用的平民识字课本。陶行知邀请著名的史学家朱经农合作编辑《平民千字课》。这套书的宗旨,包括培养人生与共和国民必不可少的精神和态度;训练处理家常信札账目和一般的应用文件的能力;培养继续读书看报及领受优良教育的志愿和基本能力^[29]。③创立平民读书处的组织形式。平民学校是当时平民教育的主要形式,而陶行知发明了平民读书处这种教育形式。这种读书处以家庭、商店等为一个单位并鼓励一家一店内有文化者去教其他成员。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范围可大可小,时间可早可迟,人数或至少至两三人,或多至两三千人,都可”。大家可以互帮互学^[30]。陶行知积极推行读书处这种平民教育新颖实用的组织形式。他甚至把读书处办到了监狱、寺庙。军人、警察、商人、小贩、老妈子、夫役、犯人都成了读书处的成员。1925年的爱尔兰世界教育会议、檀香山会议对中国的平民读书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创办教育图书馆、倡导组织平民读书运动是新图书馆运动时期陶行知最重要的和图书馆有关的活动,当然他后来的人生历程中还不断对图书馆事业做出贡献。比如,在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时期,创办了“书呆子莫来馆”,藏书达到2万余册,把其中的教育图书专门扩充建成了教育图书馆^[31]。1930年以后,他到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创办“萧场儿童流通图书馆”,特别注重儿童图书馆和流通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他指出:“流通图书馆应普遍设立在学校里,供大众公阅。小先生和传递先生可以代他们的学生借书还书。……流通图书馆为大众自学之重要机关,必须努力普及。”^[32]1935年,他在《流通图书馆与普及教育》中明确指出:“从藏书到看书,从看书到借书出去看,这个过程是代表了图书馆发展之三阶段,也就代表了普及教育发展之三步骤。让人借书出去看是流通图书馆的特性。”“流通图书馆的对象是大众,它必须为劳苦大众充分的服务,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流通图书馆。”他还

指出,流通图书馆不要收借书的保证金,只要有介绍人即可,他提倡民众自己办小小的流通图书馆^[33]。抗日战争以后,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他把会管理图书列为育才学生23个技能之一,会管图书包括编目、晒书、修补、陈列、借书等^[34]。育才学校在1939年创办之初就有5000册图书,图书馆分中文书库、西文书库、儿童书库、阅览室、借书室^[35]。为了建设育才学校图书馆,他甚至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写信给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商请组织征书队,发起了征集3万册图书的活动^[36]。黄次咸先生一次就捐书900余册。这些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是陶行知在新图书馆运动之后坚持新图书馆运动精神的见证。

4 新图书馆运动的历史价值

新图书馆运动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对于这个运动,至今,甚至还有人怀疑其存在的真实性。其实,陶行知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报道新图书馆运动的人。他在写给“万国教育会议”的报告《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一文中明确设立了“图书馆运动”的专门章目^[37]。据笔者考证,这可能是最早研究新图书馆运动的文章了。据此,我们无法怀疑新图书馆运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新图书馆运动的重要历史价值。

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路线一般是从欧洲到日本,再从日本到中国。而中国的图书馆学汲取外来知识基本上没有遵循这条传统线路,而是从美国到中国,中国留美学生是直接的媒介。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美国的图书馆学诞生于进步主义教育时期,它的知识论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强调图书馆的民主性、民众性。这个优良的学术传统也被带入中国。这正是中国新图书馆运动的理论背景和学理资源。陶行知的工具主义“图书论”为我们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个重要例证。

其次,从陶行知与新图书馆运动的关系这个个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新图书馆运动之所以成为一场运动,就因为不是局限于图书馆界内部的业务革新活动。之所以可以成为一场运动,就在于其广泛的社会参与度。梁启超、颜惠庆、蔡元培、范源濂、熊希龄、胡适、丁文江、陶行知、李大钊等等许多非图书馆界的社会名流关心图书馆的活动。社会教育科学界名流们都认识到了图书馆尤其是公众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所具备的重要价值。1922年,中国已经有公众图书馆290所,藏书152847册。到1925年,中国登记的白话

刊物杂志达到1323种。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有25所设置完善的大学图书馆,藏书近百万册。如何使图书馆真正发挥社会教育的功能是当时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也是新图书馆运动的社会基础。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五四运动既是拯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也是启蒙运动的继续。新文化运动着眼的是上层知识阶层的启蒙,而五四运动则把这场启蒙扩展到下层工农民众。“五四”之后,民众教育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继续和深入。陶行知等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培养国民的自治精神,在于培养公民的宪法精神,而具备基本的读书识字能力是基础的基础。这就把新文化以来的那种比较空洞的启蒙思潮落到了实处。学界一般认为1917年到1926年是新图书馆运动开展的大致年代,这个时间段和“新文化运动”到“民众教育运动”的时间段是吻合的。这并非是巧合,而是告诉我们,新图书馆运动是整个时代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民众性、民主性、开放性成为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关注的中心内容之一,大家逐步意识到民众问题不解决,中国问题就无法解决。新图书馆运动关注的内容之一就是图书馆如何为民众服务的问题。在新图书馆运动中公共图书馆之所以得到突出的强调,就是因为它是为民众服务的。因此,新图书馆运动本质上是配合服务民众启蒙、民众教育的时代任务的。这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中从理念到行动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书是一种工具,是为了用的,为了所有人所用。普通民众也是图书馆的主人。如果说民众教育运动是新文化和五四运动的继续,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新图书馆运动的历史价值在于它非常强调图书馆对民众教育的作用,新图书馆运动是当时民众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与思想启蒙的运动。

参考文献

- [台]林玉体. 美国教育思想史.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329~330
- 3,5 陶行知.“伪知识”阶级. 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119(以下《陶行知全集》皆为同一版本,不再一一列出版本信息。)
- 4 行是知之始. 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5
- 6 湘湖教学做讨论会记. 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14~15
- 7 答朱端琰之问. 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19
- 8 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 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528
- 9 图书馆之真意义. 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351
- 10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之进行方针与计划. 见:陶行

知全集·第1卷,617

- 11,18 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会呈文. 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555
- 12 程天放. 现代图书馆所负的教育使命. 安徽教育,2(3)
- 13 筹划全国教育费委员会简章. 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385
- 14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 见: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审查报告;徐仲迪等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63
- 15 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务报告;民国十一年二月至六月. 见:陶行知全集·第12卷,69
- 16,37 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 见:陶行知全集·第6卷,217
- 17,22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社务报告. 见:陶行知全集·第12卷,134~135
- 19,21 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社务报告. 见:陶行知全集·第12卷,95
- 20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上的社务报告. 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538
- 23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社务会议上的报告. 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458
- 24 中华教育改进社十三年进行计划. 见:陶行知全集·第11卷,121
- 25 尽力所为,问心所安. 见:陶行知全集·第11卷,179
- 26 东原图书馆募捐办法. 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621
- 27 长江流域平民教育运动之性质组织及方法. 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478
- 28 学生与平民教育. 见:陶行知全集·第11卷,114
- 29 平民千字课·本书注意事项. 见:陶行知全集·第5卷,5
- 30 平民教育之重要和办法. 见:陶行知全集·第11卷,215
- 31 晓庄学校民国十九年的计划大纲. 见:陶行知全集·第2卷,395
- 32 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 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241
- 33 流通图书馆与普及教育. 见:陶行知全集·第3卷,324~325
- 34 育才二十三常能. 见:陶行知全集·第4卷,33
- 35 谢赞助赐捐——致程希孟等. 见:陶行知全集·第8卷,505
- 36 商请组织征书队——致陈裕光. 见:陶行知全集·第8卷,469

李刚 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 通讯地址:南京大学. 邮编210093。

倪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2007-07-25)